

COMPENDI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普通社会学纲要

[意] V.帕累托 著

田时纲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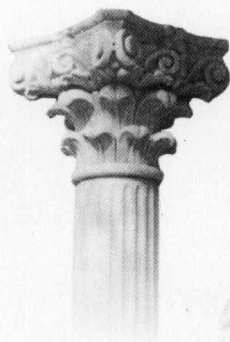
東方出版社

COMPENDI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普通社会学纲要

[意] V.帕累托 著

田时纲 译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通社会学纲要/[意]V. 帕累托著 田时纲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060-2719-9

I. 普… II. ①帕…②田… III. 社会学 IV.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2926 号

本书根据 Einaudi 出版社 1978 年版译出

普通社会学纲要

PUTONG SHEHUIXUE GANGYAO

[意]V. 帕累托 著

田时纲 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472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2719-9 定价:4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简介

田时纲，1945年4月生于天津市；哲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葛兰西学会（International Gramsci Society）会员。1967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专业毕业，先后在部队锻炼2年、农村中学任教8年。1978年—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学习，师从夏甄陶教授。1981年—1983年在罗马大学哲学系进修理论哲学，师从科莱蒂（Lucio Colletti）教授和瓦伦蒂尼（Francesco Valentini）教授。回国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其间，曾先后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文化处和研究室工作。

多年来致力于研究现代意大利哲学，主要著作有：《悠远与凝炼——二十世纪意大利文化》（合著）、《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第4卷（合著）、《〈普通社会学纲要〉导读》；主要译著有：帕累托的《普通社会学纲要》，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十九世纪欧洲史》、《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理论》和《自我评论》、葛兰西的《狱中书简》。

喜欢的格言：Segui il tuo corso, e lascia dir le genti!——你行你路，任人评说！

◡ 内 容 提 要 ◡

本书是意大利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帕累托的代表作，着重论述了他的三大理论：行为理论——主要涉及人的非逻辑行为；精英理论——主要探讨社会分层和统治阶级循环问题；社会系统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动态平衡问题。他在此提出了理想社会模式：理想社会能够进行连续不断并井然有序的精英循环，从而保障社会处于动态平衡。一旦精英循环中止，社会就处于静态平衡或爆发革命。本书对现代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产生深远影响。修订版除对译文做了修改，还添加长篇译序、帕累托生平著作年表和索引，更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责任编辑: 张伟珍
封面设计: 肖 辉

目 录

译 序	1
第一章 导论	61
第二章 非逻辑行为	71
第三章 学说史中的非逻辑行为	83
第四章 超验的理论	93
第五章 伪科学理论	122
第六章 剩余物	135
第七章 派生物	168
第八章 剩余物与派生物的特性	197
第九章 社会的一般形式	243
第十章 历史上的社会平衡	294
意汉术语对照表	329
意汉人名对照表	334
汉意术语索引	339
汉意人名索引	343
帕累托生平著作年表	348
初版译后记	353
修订版附记	355

Ω

┐

Z

W

┐

Z

○

U

译 序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Pareto, 1848—1923) 是 20 世纪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任何一部严肃的有关西方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思想史的著作都不会遗漏他的名字。因为理论成果是思想家人生经历的体验和感悟, 是对时代的反思。因此, 很有必要了解帕累托所处时代的特征, 认识他在时代大潮中的活动、文化背景和思想发展的轨迹, 考察他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态度。

【一】

(一) 剧变与动荡的时代

帕累托生活在意大利和西欧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和动荡不定的时代。在 1815 年维也纳会议之后, 封建势力在意大利复辟, 只有威尼斯和热那亚两个共和国幸存, 但自由与独立的精神已深入人心。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党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其纲领是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居多数的温和民族主义者 (以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为代表) 主张以撒丁王国为基础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帕累托的父亲拉斐莱·帕累托 (Raffaele Pareto, 1812—1882) 出身于热那亚的名门望族, 因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被萨沃亚统治家族视为危险的激进分子, 被迫流亡法国。拉斐莱·帕累托同法国平民姑娘玛丽·麦泰涅 (Marie Metenier, 1816—1896) 结婚。1848 年 7 月 15 日, 小帕累托在巴黎出生。当时的意大利被西欧强国瓜分, 北部的伦巴第和维内托大区由奥地利统治, 南部是西班牙统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 中部是教皇国, 其余有数个大小不等王国和大公国。就在帕累托出生前 4 个月, 在威尼斯和米兰爆发反抗奥地利统治的武装起义。虽然起义被残酷镇压, 但从此点燃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烈火。在经历两次独立战争, 无数次大小战役和武装起义后, 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 从西西里比伐势如破竹, 又利用法军因普法战争失利被迫从罗马撤军的历史机遇, 于 1870 年 9 月 20 日攻占罗马, 建立以罗马为首都的意大利王国, 意大利最终完成民族统一大业。

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百业待兴, 但问题与困难重重: 各地区间政治与经济差异甚大, 尤其是经济较发达的北部、中部同经济相当落后的南方的差异, 此时出现贫苦农民向美

洲大规模移民,南方问题日益严重。与此同时,意大利为了同其他欧洲强国竞争,在非洲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用武力侵占厄立特里亚(1885—1896)、索马里(1889—1905)、利比亚和爱琴群岛(1911—1912),并在1902年在中国获得以天津为中心的租界(面积1500平方英里)。

意大利从收复罗马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870—1915),在全国经济和社会领域得到全面发展。此时平静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利于意大利调整经济结构和进行行政机构改革。铁路网和基础工业往往利用外资得以发展。同时,意大利竭力加强其国际政治关系(同德、奥组成三国联盟)和贸易联系,即使最终不得不采用贸易保护政策保护仍然脆弱的国民经济。农业由于国内市场价格下跌、大部分农村条件落后以及疟疾流行而遇到重重困难,但工业却取得全面增长。纺织、冶金和机械工业,因得到充足水电供应而欣欣向荣。

在此期间,南方频频发生农民反抗沉重捐税负担(如臭名昭著的磨房税)的抗议活动。工业无产阶级纷纷组成工会和政党:1891年在米兰成立劳动联盟,1892年在热那亚成立意大利劳动者党,第二年改称意大利社会党。1897—1901年,爆发“世纪末危机”。1898年5月,米兰人民为反抗物价飞涨举行抗议示威活动,遭到军队的炮轰和血腥镇压。政府通过战时法,解散了各种政治组织,逮捕了其主要领导者。1900年大选左派获胜,1904年意大利社会党组织第一次全国总罢工。1912年召开的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党的路线实现革命转折,右翼改良派被清除出党。

1913年意大利实行普选制,但妇女仍被排除在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意大利同统一初期相比,经济政治实力同欧洲强国的差距缩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5—1918),意大利先是保持中立,在领土要求遭奥地利拒绝而得到英、法支持后,才公开退出三国联盟,加入协约国。意大利虽然在大战中获胜,但实力消耗殆尽,经济千疮百孔,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政治危机接连发生,社会动荡不定,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当时软弱的政府无力控制局势。战后相继成立斯图尔佐的人民党(1919),葛兰西领导的共产党(1921)和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战斗运动(1919)。与此同时,社会党力量壮大,在1919年大选中同人民党一起获胜;社会党获156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到1920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并占领工厂;社会党人在米兰和博洛尼亚掌权。

1919年3月,被社会党清除的墨索里尼成立法西斯战斗运动时,力量并不大。但由于当时的焦利蒂政府妄图利用法西斯扼制社会党;资产阶级对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感到恐惧,希望强有力政府克服无政府状态;民族沙文主义者对战后安排不满,要求领土扩张;而墨索里尼恰恰适应这些需要,因此发展很快。1919年法西斯战斗运动只获4000张选票,1921年大选中就翻了两番,获得35个议席,就改组成国家法西斯党。法西斯党徒加剧反对社会党人和工会的暴力行为。由于这些暴力行为未受惩罚,墨索里尼更加肆无忌惮,在1922年10月28日组织武装游行——“向罗马进军”。29日晚,国王拒绝签署实行

紧急状态，反而任命墨索里尼组织内阁。墨索里尼上台初期，尚保留议会民主制的形式。在帕累托逝世的1923年，随着多数选举法的通过（获得25%选票的政党，可以获得三分之二的议席），墨索里尼就为实行独裁统治扫除障碍。1924年6月10日在暗杀反对派领袖马泰奥蒂后，墨索里尼取缔所有反法西斯政党。从此，墨索里尼在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侵略扩张的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都灵岁月

1854年，6岁的帕累托随父母第一次踏上祖国的土地。他的父亲在热那亚皇家海军学校教授法语。帕累托11岁时全家迁往卡萨莱蒙菲拉托（Casale Monferrato），其父在当地著名的技术学校农艺系任会计学和农学教师。年轻的帕累托在该校学习物理和数学，同时跟家庭教师学习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为大学入学考试科目）。在父亲的指导下，帕累托饶有兴趣、刻苦地学习算术、几何和物理，并取得优异成绩——年级第一，还跳一级、直升三年级。

1862年，帕累托全家迁往北方工业重镇都灵。帕累托在都灵皇家技术学校学习三年，1864年7月以各科满分的优异成绩通过中学毕业考试。校长在全体教师面前表扬帕累托：学校为能把这样优秀的学生送往大学感到骄傲，而且他是班级年龄最小的毕业生，才刚刚16岁。随后他又参加都灵大学入学考试，以总分27分（满分为30分）的好成绩被该校数学系录取。

刚刚踏入大学校门，勤奋好学的帕累托偶然读到波舒哀和巴师夏（F. Bastiat）的著作。他不喜欢波舒哀，而巴师夏的《和谐经济》对社会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尖锐批判使帕累托印象深刻并深受启发。确信自然规律的力量，人们竞相朝着永远达不到的伟大最终结果前进，但越来越接近这个结果，它是所有阶级向越来越高水平的无限接近；换言之，是个人在普遍改善中的平等。这种信念巩固了帕累托的知识形态，并且影响未来看法。他20岁时阅读巴克爾（H. T. Buckle）的著作，立即被其吸引，他感觉在社会科学中没有更多的价值；在其中他发现曾在大学学习过的物理学应用的方法；他还感到很惊奇：竟有人那么无知和迷信，以致不能理解那些学说。从另一观点看，巴克爾使他确信：即使历史事实、即社会现象的集合系列，也受一致性的并在统计学上可证实的规律的制约。追随巴克爾，帕累托认为，同智力与经济原因相比，人们的道德水准在决定社会的一般进步中所起作用并不大。他赞同巴克爾的意见：“人们的智力因素，包括在这种表达中其信仰性质，其认识整体及其智慧的发展，是决定进步的主导环境。”

与此同时，帕累托满怀激情地关注当时关于科学的激烈论战：关于欧几里得的第五公设的讨论，关于逻辑上完美的几何学能否以非欧平行性概念为基础的争论，关于有限量值代数学能否被集合论代替的辩论。

帕累托在都灵饶有兴趣地关注法国数学家柯西（Cauchy）的大胆尝试：通过严格界定函数积分概念和确定条件，以使无限算法能产生一个数值作为其有限价值。在都灵大

学的师生中,挪威数学家阿贝尔(Niels Henrik Abel)产生广泛影响,帕累托从教师那里深刻认识阿贝尔对椭圆函数和交换群研究的重大意义。

恰恰在那几年力学逐渐成为无穷小分析的分支学科,帕累托特别喜欢听力学课。他总把原籍法国的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J-L. Lagrange)的《分析力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反复阅读并激动不已,拉格朗日的理论成为有待模仿和追随的模式。当德国数学家及物理学家克劳修斯(R. Clausius)最终证明一个物体在经过一系列变化后,又回复到初始条件时,帕累托最终确信,合理解释在于将现象纳入力学基本规律。

因此,那些勇敢捍卫力学的都灵大学教授最受帕累托爱戴和崇敬就绝非偶然:安杰罗·杰诺吉(Angelo Genocchi)教授是分析和微分学专家;罗塞利尼(F. Rosellini)教授是杰出的代数学家;库里奥尼(G. Curioni)教授对平衡理论造诣颇深,这种理论把平衡理解为对立又并存的力量间的平衡,这里潜在转换代数值是无,潜在不转换代数值是负数。

1869年,帕累托恰恰在库里奥尼教授指导下,准备工程系毕业论文。这篇论文涉及应用力学和应用水力学、市政水利建设、蒸汽机和铁路(借助克劳修斯的平衡论,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实用几何学、建筑学和经济学等问题。论文长达40页,题目是《论固体弹性论基本原理和关于决定固体平衡微分不等式的研究》。

这篇论文明显反映出帕累托的思想倾向和基本看法。他在论文的开头写道:“我以为精心研究分子力学永远是理性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每当尝试将数学应用于物理学,就需要从它意味着的原则和公理出发”。这样的公理是类似于纯数学的,即抽象的公理,还是从经验中发掘的呢?他的答案十分清楚:“我相信我们同胞学者、莫莱肖特(Moleschot)教授的看法,数学同其他所有科学一样,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不存在真正的公理,它们是长期经验使我们认识的真理。”譬如,“长期经验”“引导我们相信”物质是“由极微小部分或原子构成,而各个部分相结合则因分子引力的原因”。从这种“真理”出发,他构建自己的固体弹性论;该理论认为“分子引力不仅在原子间起作用,而且在我们称作分子的原子组合中起作用”。

在他尝试解决微分不等式的积分法问题(在函数和变量中确定变差)后,最终给平衡下了定义。

同经济平衡论及社会系统平衡论的相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多年后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其经济平衡论和社会系统平衡论。将一个领域的理论类似应用于另一领域,是物理学家的典型方法,这是那种读过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和穆勒(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物理学家。其后,帕累托通过阅读穆勒的《逻辑体系》,穆勒的归纳方法,和谐、差异、剩余及并存变化的法则使他备感亲切,并引起他对斯宾塞和贝恩(Alexander Bain)著作的兴趣。他一再阅读贝恩的《兴奋与意志》和《感觉与智力》,尤其是《精神与道德哲学》更令他爱不释手。从这些著作中,他发掘出对行为的区分:理性行为和本能行为(或剩余行为);本能行为恰恰是人类生活的一组持续、普遍兴奋的

表现。

至于斯宾塞，帕累托熟悉其全部著作并特别推崇其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系统的实证基础并得出进化的定义——由运动耗散伴随的物质的补充。

在都灵，帕累托对达尔文主义十分熟悉；尤其在那些年，都灵成为意大利传播达尔文理论的中心。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对物种变化成功提供“科学”解释，并从对物种变化的经验认识上溯到探究其原因，在年轻的理工科大学生帕累托眼里，远比孔德的哲学更具吸引力。这些大学生和青年学者确信力学和大胆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世界。生存斗争的概念、或更显著的自然选择的概念，由于它使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展现出伦理学前景，不能不令青年资产阶级学者欣喜若狂并满怀希望。数年后，帕累托写道：“正像对动物来说，生存斗争是促进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它进化规律才起作用，我觉得它对人类社会也不可或缺，这一普遍规律延展到人类社会。若我们对冠以生存斗争之名的现象进行考察并深思熟虑后，准备好的结论既不少也不轻松，这些结论因其新奇可能被多数人拒绝，而科学家认为那些都是正确推理得出的结论。当然，某些结论似乎不太可笑，但真理自身具有的价值，不是由于我们认为在其中发现对我们的自爱心、激情或情感所说的恭维话。地球靠人的自夸，一度被视为宇宙的中心，现在科学证明它不过是最卑微星球的卑微卫星。”（请读者注意，后来帕累托在形成自己的社会学体系时，继续坚持这种实验——经验的认识论路线，但批判了自己曾信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总之，青年时代的帕累托，其文化构成的主要因素是理论力学和达尔文主义。

1870年，不满22岁的帕累托在毕业论文顺利通过后，又以各科满分成绩获得都灵大学工程系毕业证书。随后，他赴佛罗伦萨，在意大利铁路公司动力材料服务部任见习工程师，月薪150里拉。

（三）托斯卡纳年代

以佛罗伦萨为首府的托斯卡纳地区是风光秀丽、人才辈出的地方，这里涌现出但丁、马基雅维利、列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伽利略等文化巨人。帕累托在地灵人杰的佛罗伦萨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文化与政治活动，他的文化结构主要是文学、哲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他出入当地著名文化沙龙，结识文化界和学术界名人，参加学术讨论并作报告。

1874年帕累托升任国家铁路公司工程师，1880年年仅32岁的帕累托被任命为公司总经理，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到1890年。然而，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管理体制的弊端、官僚制度的腐败，使帕累托深感工作艰难和困惑，一再要求辞职。

1874年7月连续发生的两件事使他对左派工人运动产生反感。一次，公司派他到炼铁厂宣布辞退一个工人，结果被那名工人用铁钳击伤右臂。另一次，他夜里两点下班回家，被埋伏好的五个人挡住去路，他迅速从口袋中掏出左轮手枪，走到他们之中，对方

才没有动手。帕累托认为这都是第二国际在工厂煽风点火造成的。进而他对左派抱有偏见：左派“不知自己想要什么，不知如何达到预期目的，沦为小的、令人讨厌、痛苦和难以忍受的反对派”。

帕累托虽为公司总经理，但“影子内阁”凌驾于他和董事会之上，只有两个头儿说了算，责任却要大家承担。帕累托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很遗憾，因为我准备做好工作，但是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障碍，从而导致我的工作能够达到的水平不高。然而，若由于工作本身既美好又迷人，我们就不应抱怨由无知、无信、恶意设置的障碍（它们使工作部分无效），那么我确实不具有这样的美德。我是个凡人，不是圣徒。谁要想退隐沙漠只靠野草和树根生活并宣扬基督教屈从，那就决意做好了。我想生活在社会中，具有人的激情和人的意愿。”帕累托认为人应有责任感和道德力量：“我要感谢上帝，总让我找到足够力量以履行自己的职责。诚然，我可能犯错；但拒绝自己良心判断、接受他人判断，就能保证少犯错误吗？我相信人生真正唯一幸福在于，确定无疑地认识我们的责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帕累托崇尚理性，主张充分尊重他人的意见和信仰，为此也要求他人对他的意见和信仰也有点宽容：“我说的是宽容而不是冷漠，因为宽容丝毫未损害友谊之情，相反没有宽容就不会有真诚的友谊，而冷漠扼杀友谊之情。”

在托斯卡纳期间，帕累托从未放弃政治。1880年5月他在蒙泰瓦尔吉（Montevarchi）选区首次尝试竞选参议员，他声明持温和派立场——“我既不赞同右派观点，也不赞同投机商人，我赞同一种使命，它至少保持温和路线”；结果没有当选。1882年8月31日，他再次决定作为中派（温和派）候选人参加皮斯托亚—普拉托—圣马尔切罗选区立法选举。帕累托认为皮斯托亚山区所有选民和普拉托的企业家都将支持他；然而他只获得1957张选票，再次落选。似乎是对两次落选的补偿，1883年8月12日，由工商部部长提名，王国政府授予他意大利王冠骑士勋章。

19世纪80年代，意大利政府开始实行殖民扩张政策，发动侵略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战争。帕累托对这种政策持否定和悲观态度；他指出政府在推行修筑铁路等工业化措施后，需要为那些种田人和使国家致富的人们找到另外的活动。但民众所受教育水平不足以理解政府行为的后果；政府要用征伐非洲激起民众的自尊心，而民众欢呼雀跃，并未想到冒险行动将付出沉重代价。他痛斥当时的德皮雷蒂斯（Depretis）政府是意大利和其他代议制国家中最腐败的政府，揭露那些投机取巧的政客“都是些菜汤和软面包，是耗尽国家财富的蠹虫，一些人为了政治野心，另一些人为了捞钱，他们既无信仰也无原则……”。1889年10月10日，帕累托在杰欧戈菲利（Geogorfilì）学院作报告，严厉谴责意大利政府的非洲政策。他认为意大利人民本质上是热爱和平、反对殖民战争的。多年后，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国家在中国的强盗行径决不比阿提拉在罗马帝国的暴行逊色”。这说明帕累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殖民政策是一贯的。帕累托还表现出反对君主制和教权主义的立场，他说“那些在白天不厌其烦地宣扬世界上最好的政府是君主制、王朝的政府”，“教皇代表国际利益”的人，“肯定不是好人”。

1886年9月22日,帕累托遭到卡尔洛·阿莱桑德利(Carlo Alessandri)伯爵的恶毒攻击,后者在佛罗伦萨到处散布说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不属于热那亚的帕累托侯爵家族。为此,帕累托提出同伯爵决斗。后来他承认一位民主主义者为贵族头衔决斗实在可笑,实际上那头衔“不值一个无花果干”。当然,这件事也反映了帕累托坚毅果敢的性格:“我爱见到朋友,但我不怕身处敌人之中,甚至饶有兴趣地身处其中。假若我惧怕某个人,我认为自己太渺小、太卑劣。我走我的路,若有人找我的麻烦,他将付出代价。语言、铁和铅总能给予像我这样的不幸者正义”。24日,伯爵承认错误,并向帕累托正式道歉,决斗取消。

1889年12月23日,41岁的帕累托在佛罗伦萨同29岁的俄国姑娘阿莱桑德拉·巴枯宁(Alessandra Bakunin)结婚。

1890年1月,帕累托结识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潘塔莱奥尼(M. Pantaleoni),这对他致力于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两人兄弟般的真挚友谊保持终生。7月,意大利铁路公司总部迁往罗马,由于帕累托不能前往,离开总经理职位,改任技术顾问。帕累托感到如释重负:“我真是太高兴了,多年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进入公司那天就该诅咒!”不久,他迁往非索莱(Fiesole),距佛罗伦萨8公里幽静的山区小镇,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习。

在非索莱居住期间帕累托反复阅读穆勒、贝恩、斯宾塞和巴哲特(Bagehot)的著作。他在阅读卢伯克(Lubbock)的《史前时期和文明化的起源》、巴克尔5卷本《英格兰文明史》法译本后,认真思考并记下笔记。通过对这些著作的学习,帕累托更加确信:只有科学、对自然规律的科学认识,才给予人们行动手段。尤其是巴克尔,他使日趋完满理性进步到对自然精确研究,而斯宾塞则克服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异,这些都对帕累托的思想产生了广泛影响。

帕累托在佛罗伦萨时还开始撰写关于比例代表制和普选制的文章。这些文章明显受到穆勒的影响,尤其是《自由》和《对代议制政府的考察》的影响处处可见。

对帕累托来说,正像对穆勒来说一样,自由总要施以恩惠,自由促使个人人格的向善,并因此促使文明的提高。

选举制改革和普选权扩大(显然要依靠一定程度的教育),变为扩大个人自由的手段,而不是使社会民主化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帕累托似乎比他的导师更暧昧不清:“我觉得应到保障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必要性中探寻政府权力的确定起源;代议制的目的应该是研究能更好引导实现预想目标的途径。”然而,由于多数的权威和社会影响导致司法和非司法强制形态产生并日趋扩大,这就赋予政府重要的调节权力,需要尝试限制这些危险,承认富有教养和进步的少数被代表的权力。帕累托进而写道:“在这方面人们更多地表明,必须由深刻的思想家和形形色色意见的最好代表构成立法议会,以便从激烈辩论中产生照亮错综复杂问题的光芒,这样的光芒往往由社会科学代表。”

那种自由主义,在民主中只看到数量的力量,而在数量中只看到最落后并带统治倾

向的意志表现,因此本质上是对“实际自由”的否定。它迫使帕累托大声疾呼:“不,你们的正义不是我的,不应由力量来支撑社会,使意见获胜的不应是监狱与断头台。这不是我那种正义,它让各得其所。而你们的正义成为任何滥用权力的帮凶,只要打着合法性幌子去干。”

无疑,帕累托主张的自由主义是作为这样一个社会阶级的学说和政治实践介绍的;该阶级认为:为了社会利益,它已超越利益、社会地位、阶级处境的差异性;它以公共利益和普遍福利的名义,凭借“天生”旗手素质,可以调解冲突。换言之,帕累托的学说完全无视意大利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进程;完全无视社会划分为阶级,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统治和剥削,各个社会阶级和政党制定和捍卫不同目标。它相信人类利益的和谐,确信多数人的利益自然地源于个人利益的实现,假设以人类行为抽象合理为基础的团结和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行为应该是“纯粹被动的”,应局限于“直接地阻止恶的有限界限”。为了控制这种行为,需要“产生一个议会,由全民族最有教养、最聪明的人士组成”,目的在于“既避免芸芸众生的平庸才智,又避免他们携带的偏见和错误,若缺乏对他们的教育,就不能解放大多数”。仿佛智慧和文化源于“人性”赋予的才能,并借助这种才能才获得,而不是由社会出身和所属集团背景决定的社会建构。

显然,政府行为和作用不能不是对事物自然秩序的扰乱。政府对事物自然秩序的干预是恶劣的:扰乱平衡,败坏市场完美,破坏为实现个人利益和达到集体最佳状态的条件,总之,致使个人不可能同社会相适应和相一致。有限的政府调控,契约可能的无限扩展,对私人积极性的保护与加强,这些是社会生活良性运行的可靠保障。这是因为,正如斯宾塞在《社会学原理》中所说,“社会组织形态由人类本性决定,并且只有随着人类本性的完善,社会组织形态才能变得更好”。

帕累托确信:“为了获得国家利益,除有此愿望外,还应认识这种利益并知道实现目的的方法。我们还承认(有些适当保留),第一个条件在现代政府中已完成,而第二个条件在现在和过去的政府中都未实现,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人们不知道在一个人类社会中运用哪些手段能获得确定效果。”

帕累托以法国政府采取的工业措施为例加以说明:“当蒸汽锅炉在法国开始广泛使用时,法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制定出新规则,它甚至想要规定锅炉壁的厚度。目的极好:保护公民的生命。手段也值得赞誉:权威的数学家致力于研究蒸汽压力,政府为锅炉壁的厚度确定了公式,自然这是在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公式。然而此公式有一个缺陷,这也是一般立法规定的共同缺陷;它静止、僵化、不动,而世界在前进。许多事物的进步是缓慢的,有时刚刚能感觉到,但冶金学在最近几年取得惊人进步,锅炉制造技术迅速改善。法国锅炉制造者无任何理由研究用于该国锅炉的高质量钢板,因为无论钢板质量好坏,法律强加同一厚度,自然钢板好的锅炉价格高于坏的。然而对于出口国外的锅炉,却选择质量好、厚度薄的钢板。现在事实是这样:钢板越厚质量越差,就越易出问题、

损害其耐久力。由此可见，法国制定的法规获得一个同其目的截然相反的结果：并未增加使用锅炉时的安全度，反而降低安全度。”

因此，当国家干预关注于确定经济行为的规则和范围时，其干预是有害的。当国家奢望代替私人积极性时，其干预变得十分危险：“被私人饲养者改良或创造的动物良种并不少见，尤其在英国。然而由意大利政府改良的良种马从未听说。”帕累托对意大利政府对铁路干预政策的严重后果有切身体验：领导层缺乏创见，层出不穷的内耗，管理混乱，效率低下。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写道：为什么意大利人，尤其领导阶级不向明显的良知让步？

良知和历史，都向我们证明这点。帕累托写道：“国家机关和私人公司的性质和生命截然不同，正如历史所证明，当私人公司手握司法和维护公共秩序大权时，更关注自身而不是国民的利益，就做了糟糕试验；同样，经验让我们看到，当国家超越自己的范围，想要侵占工业领域，不会取得比私人公司更好的结果，相反几乎总是更糟。这些可从我们引证的军火制造商和其他类似企业家的证据证实。”^①

在那些年代，意大利社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文化与思潮的更新，民众或多或少的觉醒。帕累托的信念是：“假若每个政党都想利用国家政权为自己目的服务，很可能任何政党都达不到目的，只能严重地扰乱国家。在这个国家内，将会看到人们轮流执政，今天是被压迫者，明天就成了压迫者，在连续的行动和反行动中消耗其祖国的有生力量。假若把国家视为中立区域，而公共权力的活动只用于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那么在斗争之中总保留某些稳定和肯定的东西。在这样的条件下，当人们未超越合法性界限，当人们只期待着胜利从推理和说服中获得，最终当对手的权力不断地被尊重，那么斗争就不是无益的，而是丰饶和有益的。由于胜利不是属于最强者，不管他们是谁，而是属于最相称者。”^②

（四）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批判

从1878年至90年代初，帕累托从自由贸易主义者立场出发，对当时意大利政府经济政策进行猛烈批判。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保护劳动和企业主要对劳动者工伤负民事责任的法律。帕累托认为这些法律同制定时的初衷相左，忽视经济学规律，类似于乌托邦；人们需要牢记：“自然规律是命定的，无法逃避的，不会像人类规律那样遭受算计和欺骗；谁要违犯自然规律，肯定会给自己带来应得的灾难，他会愚蠢地控告政治经济学残酷，仿佛科学不是对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认识，而是别的什么，仿佛科学能够有害，相反它不是总有益。因此，我们充分相信科学，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真理是永恒的，真理必然胜利。”

① 帕累托：《政治论文集》，第1卷，都灵出版协会，都灵，1974年，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132—134页。

其后，帕累托从满怀激情、充满希望逐渐变得忧郁、怀疑、悲观，甚至带点犬儒学派的色彩。总之，帕累托曾经说过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意大利，成就我们父辈伟业的自由精神萌芽尚未被破坏；即使大家开始对集体女神顶礼膜拜，但我要指出还活着另种宗教、另种信仰。”

帕累托越来越坚信国家没有能力管理经济事务，对此他深感痛苦和不可忍受。1887年意大利政府决定征收海关税，促使帕累托发生上述转变，以前他怀着对牛弹琴的情感，现在他具有凝视蠢人世界的印象。他认为征收海关税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政府获取新财富，用以实施旨在益于少数人而损害劳动群众的政策。“露骨的利己主义，中产阶级的近似盲目，让我们隐约看到未来阴暗的前景”。

帕累托认为，自由贸易以任何产品都在使用最少劳动的地方生产的方式自然促使再生产，另外通过交换，每人都能以最低价格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保护主义的名义下，一切扰乱导致一种平衡，它们直接结果就是在总体上，人们不得不增加劳动以获取等量的产品或享受”。

1888年，因意大利政府决定提高粮食税率，从而使局势更加恶化。帕累托尖锐地指出，提高粮食税率“以补偿农场主十分之一的收益……只吃面包的穷人能为部长投票以换取部长的恩惠吗？为此，他们付的税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农场主拥有选票可做交易，因此得到减税并让其同胞为购买小麦付更多的钱”。

帕累托认为，不仅扩充军备、征伐非洲，而且修筑铁路、盲目扩大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消耗大量财富。而议会中那些不懂经济规律、缺乏良知的人，主要是商人和机会主义者要对这种经济形势负责。

不能说帕累托对经济与贸易危机的社会后果不够关注。为解决经济危机，他只想到古典方法：重建贵金属储备，削减政府开支，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换言之，“一种贸易危机是滥用信贷的后果，其偿付可通过反向的反作用得以实现”。

帕累托预见，社会主义浪潮将席卷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进步到处直接导致领导阶级对经济自由和正义的限制。对经济自由的冒犯，或迟或早将结出苦涩的果子。不幸预见不可抗拒，灰心丧气可以预见：国家由于腐败，逐渐解体，一切败坏，一切卑劣；“在意大利，没有一个企业家，没有一个银行家不想谋取政府的恩惠，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使用最不道德的手段”。正是由于使用不道德手段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现在人们似乎感觉它们很自然。

银行丑闻，战事失利，滥用权力，贪污和牟取非法利润，议会中的政治交易，社会非正义，都受到帕累托的强烈谴责。但这种批判从未超越道德层面，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大厦基础的自觉批判，从未表现为实际、具体的代替，总之没有作为国家的，即要实现现代化并让公民满怀希望的国家的政治纲领。帕累托确信，损害国家的一切灾难都源于“减少意大利出口的海关保护政策，相当可观的国家资本投入到无用的建筑和铁路中去”。他从各个方面考察问题，结论总是一个：“贸易保护破坏的财富总额

超过付给受保护企业工人的工资总额。于是，当有人向我们说他们想保护国民劳动，我们可以回答说这是一种幻想。”帕累托认为，国家干预的本质不是刺激经济并给劳苦大众一点希望，“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驱使国家每天都扩大其职能，但这种力量通常是腐败和欺软怕硬。它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后果”。

从上述批判可见，帕累托对走上现代化之路国家的种种社会问题的考察过于简单化。他把经济自由主义看做一个僵化、麻木国度里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与实体，这种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类似宗教的崇拜，有时具有某种经济浪漫主义的色彩。但这是自由贸易主义者的推理：受保护的工业企业获取可供支配的少数资本，这些工业企业靠消费者和未受惠（可能大胆创新）的经济部门而繁荣，农产品价格下降和出口减少加重南方的悲剧，劳动群众的生活条件日益贫穷。

毋庸置疑，意大利在统一后确实出现种种弊病，但同样不能否认当时的意大利是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进口的少数工业设备尚未还本，缺乏本土技术人员和技工（并非偶然，当时企业的技术人员几乎都是外国人），既无可观的国内市场，也无可靠的国外销售市场，还未建立有效的商业网。总之，意大利不具备条件生产参与国际竞争的商品。假如意大利自由进口所有日用必需品和基础商品，对于处于萌芽状态的民族工业和正在形成中的国内市场将会产生什么后果？不少经济学家指出，意大利保护主义政策对意大利工业发展未产生重要影响，但正是凭借它意大利工业化才得以实现。

一个本质上的农业国，没有资本，缺乏技术基础设施，没有企业家阶级，当它不得不对抗外国强大企业和受强大海关壁垒保护国家生产的商品的竞争时，又能怎样努力呢？当然，国家干预不仅对建立民族工业，而且对巩固基础设施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杂乱无章地进行干预会付出沉重代价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由帕累托建议基于经济自由和国际分工的经济发展模式能使意大利摆脱经济落后状况吗？显然，似乎是乌托邦的看法。

（五）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帕累托 32 岁时曾受到社会主义的强烈吸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者都是有理想、道德高尚的人，他们是社会非正义、残酷剥削、政治腐败的死敌。他们为理想英勇斗争的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他们的理想虽然在统一后的意大利似乎行不通，但他们执著地争取更加和谐、更少剥夺和不公正的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最终对广泛阶层有益，并益于自由的扩展与实施。

帕累托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就完全赞同社会主义者对社会形势所做的分析吗？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弊病和罪恶都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而资产阶级是罪魁祸首。为此，社会主义者主张根本改变生产和财富分配制度，“要剥夺剥夺者”，把生产资料交全体劳动者所有。帕累托的回答很明确：对自由确定市场的任何干预，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不平衡和失调，因此扰乱事物的自然秩序，损害财富的生产，不可补救地破坏资